



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

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
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

先秦名家四子研究 (下)

董英哲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C14043560

B225.05

02

V2



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

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
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

先秦名家四子研究 (下)

董英哲 著



北航

C1731846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02

V2

B225.05

策划编辑: 童力军
责任编辑: 徐炜君 徐 衍
装帧设计: 肖辉严克勤
技术编辑: 富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先秦名家四子研究/董英哲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3
(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)

ISBN 978-7-5325-7206-9

I. ①先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名家—研究 IV. ①B2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9476 号

先秦名家四子研究

The Study of Four Representatives of
the School of Names in Pre-Qin China
(全二册)

董英哲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发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 插页: 13 印张: 54.5

字数: 862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7206-9/B·857

定价: 198.00 元

014043560

第三编
尹文与《尹文子》

第一章

尹文及其书的真伪和学派归属之考辨

尹文其人，史书无传，只是在若干古籍中有一些零碎、片断的记载，另有一本《尹文子》流传于世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就很难找到什么史料了。再则，关于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及其书的真伪和学派归属问题，历来看法不一，迄今尚无定论。我们认为，尹文是战国中期齐国人，稷下学宫著名学者，虽师承宋钐，但应归属名家学派；今本《尹文子》一书，乃系尹文遗著，虽残而真，并非伪书，可以反映尹文的思想。现将这些浅见归纳成四个小题，分别加以考辨。

一、尹文本人的—些情况

关于尹文本人的—些情况，由于史料缺乏，加之真伪混杂，虽经许多学者考证，但仍有不甚了然之处。例如，他的“国籍”、生卒年代、主要经历以及师承关系等都是疑义的。我们觉得这四个问题，值得考辨。

第一个问题是尹文的“国籍”。东汉末年，高诱注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·正名》说：“尹文，齐人，作《名书》一篇。在公孙龙前，公孙龙称之。”由此可知，尹文是战国中期齐国人。唐钺曾说：“尹文的国籍，除高注外，我还没有看见别处提起。高氏到底是由他游稷下而推测他是齐人，或是别有所本，现在不能说定；不妨姑且暂取此说。”^①我们认为，采取高说是对的，其证据有二：一是郑樵《通志》卷二十九《氏族略》引《世本》说：“齐有尹文子，著书五篇。”所谓“齐有尹文子”，就说明尹文是齐国人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《世本》的记载是否可靠？陈

^① 唐钺：《尹文和〈尹文子〉》，罗根泽编《古史辨》第六册，第233页。

梦家《世本考略》指出：“《世本》之篇，盖战国末赵人所作”；“宋世书目不载《世本》，则其亡佚当在南宋之际。”^①这就告诉我们，郑樵《通志》所引，当系《世本》佚文；而这条佚文，正是高注所本。既然《世本》乃战国末年赵人所作，其记载无疑是可靠的。二是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说：

宣王好射，说人之谓己能用强[弓]也。其实所用[弓]不过三石，以示左右。左右皆引试之，中关而止，皆曰：“[此]不下九石，非大王孰能用是？”宣王悦之。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，而终身自以为[用]九石。三石，实也；九石，名也。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。

《吕氏春秋·贵直论·壅塞》也有同样的一段记载，原文如下：

齐宣王好射，说人谓己能用强弓也。其尝所用不过三石，以示左右。左右皆试引之，中关而止，皆曰：“此不下九石，非王，其孰能用是？”宣王之情，所用不过三石，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，岂不悲哉！

从文字的详瞻和简括上看，《吕氏春秋》此段是从《尹文子》引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引书一般较简，而原文较详。所以，《尹文子》那段应为《吕氏春秋》所本。再从文字的提法上看，《尹文子》说“宣王好射”，而《吕氏春秋》却明确地说“齐宣王好射”。两相比较，前者少一“齐”字。这说明《尹文子》的作者尹文是齐国人，对他本国的国王不再称述国籍。此类情况，在先秦古籍中多有之。如《庄子·养生主》曾记“庖丁解牛”一事，就没有说庖丁是哪一国人。而《吕氏春秋·季秋纪·精通》在记述这件事情时，则标明“宋之庖丁”。所以，张恒寿在其《论〈庄子·内篇〉的真伪和时代》一文中指出：“从文字的提法上看，《养生主》说‘庖丁为文惠君解牛’，没有说庖丁是哪一国人，而《吕氏春秋》却明确说‘宋之庖丁好解牛’。究竟这个庖丁是何国人，且不必管。但无论他是哪一国人，都可以看出《养生主》是《吕氏春秋》以前的作品。因为如果庖丁是宋国人，而《养生主》不提他是哪一国人，却直接提出‘庖丁为文惠君解牛’，正说明庄周

^① 陈梦家：《六国纪年》，第137、135页。

是宋国人,对他本国人的故事,不再称述地点,是庄周本人记述本国事的口气。如果庖丁本来不是宋人,而《吕氏春秋》作者却误认他为宋国人,也正说明《吕氏春秋》的作者,是从庄周书中采取了此故事。他因为庄周是宋国人,便把这个不知何国人的庖丁,当作宋人。”^①这个分析颇为精当,可以适用于对尹文国籍的考辨。

第二个问题是尹文的生卒年代。与此问题相关的史料有四条:一是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·正名》说:“齐湣王是以知说士,而不知所谓士也。故尹文问其故,而王无以应。”二是《说苑·君道》说:“齐宣王谓尹文曰:‘人君之事,何如?’尹文对曰:‘人君之事,无为而能容下。夫事寡易从,法省易因,故民不以政获罪也。大道容众,大德容下,圣人寡为而天下治矣。’……”三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名家著录“《尹文子》一篇”,班固自注曰:“说齐宣王,先公孙龙。”四是晋人崔譔曾说:尹文“齐宣王时人,著书一篇”(陆德明《庄子释文》引)。根据这四条史料,唐钺考订说:“崔氏定尹文为齐宣王时人,似是根据《说苑》和《汉志》。但《吕氏春秋》明载他与湣王问答,是尹文又与湣王同时。宣王当国系由西纪前三三三年至三二四年;湣王由前三二三年至二八四年。假定宣王即位时,尹文已经三十岁,又假定尹文活七十岁,那末,尹文大约生于西纪前三六二年,死于西纪前二九三年。我想这样的估计与实际相差应该不至很大。”^②我们觉得,唐钺考订的尹文生卒年代是不准确的。因为他所据的齐宣王、齐湣王的当国之年,是在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的基础上修定而成的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所列田齐威、宣、湣三王的当国年代如下:

齐威王:公元前 378—前 343 年;

齐宣王:公元前 342—前 324 年;

齐湣王:公元前 323—前 284 年。

唐钺所据的宣、湣二王的当国之年,基本上依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,只是将宣王元年由公元前 342 年改为公元前 333 年,向后推移了一下,这可能是据《资治通鉴》所为。然而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对田齐威、宣、湣三王的年代之排列是错误的,《资治通鉴》对齐宣王元年的后移也没有根据。这在杨宽的《战国史·战

① 张恒寿:《论〈庄子·内篇〉的真伪和时代》,《中国哲学史研究集刊》第一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,第 24 页。

② 唐钺:《尹文与〈尹文子〉》,罗根泽编《古史辨》第六册,第 233 页。

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》中已经指明,其原文如下:

我们看《战国策·燕策一》说:“子之三年,燕国大乱,……储子谓齐宣王‘因而仆之’,……王因令章子(即匡章)将五都之兵,以因北地之众伐燕”(《史记·燕世家》同)。《战国策》认为伐燕子之的是齐宣王,可是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记这事在周赧王元年,照《六国年表》所排列的齐国年代,这年已是齐湣王十年了。究竟伐燕子之的是齐宣王还是齐湣王呢?据《孟子》记载:沈同曾私下问孟子:“燕可伐与?”孟子说:“可。子哂不得与人燕,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哂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篇》)接着“齐人伐燕”,“五旬而举之”,齐宣王曾为此问孟子应否“取之”。后来“齐人伐燕取之,诸侯将谋救燕”,齐宣王又为此问孟子“何以待之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篇》)。接着“燕人畔”,王说:“吾甚惭于孟子。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下篇》)那末伐燕子之的一定是齐宣王。很显然的,《史记》所排列的齐国年代有错误。前人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,想校正《史记》齐国的年代,例如《资治通鉴》曾把齐威王的年世加多十年,把齐宣王的年世移后十年。《大事记》又把齐湣王的年世缩短十年,把齐宣王的年世延长十年。目的都在求齐伐燕的年代能和《孟子》、《战国策》相合,但是这样的移动都是勉强凑合,没有根据的。^①

上述分析是很有道理的。既然唐钺所据的年代有问题,那他所考订的尹文生卒年代自然就不会准确了。杨宽曾详细地考订了齐威王、齐宣王和齐湣王的年代,这里就略而不谈了,只就其《战国史·战国大事年表》将威、宣、湣三王的当国年代排列如下:

齐威王:公元前 356—前 320 年;

齐宣王:公元前 319—前 301 年;

齐湣王:公元前 300—前 284 年。

我们认为,由于史料缺乏,尹文的生卒年代无可详考,其主要经历当在齐宣王、齐湣王时代,即公元前 319—前 284 年。

^① 杨宽:《战国史》,第 589—590 页。

第三个问题是尹文的主要经历。在这个问题上,有些古籍的记载是不可靠的。如《孔丛子·居卫》记载尹文与子思对话的一段,就是这样。子思姓孔名伋,孔子嫡孙,是战国初期(约公元前483—前402年)鲁国人,他不可能同战国中期的尹文进行对话。再如,《列子·周穆王》记载“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”一段,也不可靠。王恺鑫指出:“此寓言也,借尹文以明形气皆幻之理,非同实录。”^①唐钺也说:“《列子》一段是魏、晋间模仿《庄子》并参杂佛说而编成,而且尹文先生是虚拟的人物不能作为史料。”^②这些说法,都是很有道理的。除这两条以外,其他有关史料均须加以考虑。例如,《庄子·天下》说宋钘、尹文“周行天下,上说下教;虽天下不取,强聒而不舍者也”。颜师古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引刘向说尹文“与宋钘俱游稷下”。这两条史料都是可靠的,但学者的理解有所不同。一般都认为宋钘、尹文属于稷下学派,而有人则持异议。如金德建说:“《汉志》颜注引《别录》说尹文‘与宋钘俱游稷下’。其实宋钘、尹文能不能算为稷下学派的人,实在值得探讨。”他认为,“宋钘、尹文不属于稷下学派”。为什么?因为,“宋钘、尹文的学说和行径不像稷下派的学风”。再则,“宋钘、尹文既是‘上说下教’(见《天下篇》),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到广大的人民群众。这和稷下聚集在一块的只限于文人学士,性质也不相似”。“至于宋钘、尹文原是‘周行天下’(见《天下篇》)奔走四处八方,不是稷下一个固定地方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,当然更难以指定他们一定硬属于稷下了”。^③我们觉得,这些说法是不够全面的。首先,不能只强调宋钘、尹文“周行天下”的一面,而忽视他们长期在稷下学宫从事学术活动的一面。刘歆指出:“尹文子学本黄老,居稷下,与宋钘、彭蒙、田骈等同学。”(《容斋续笔》卷十四引)仲长氏也说:尹文在“齐宣王时居稷下,与宋钘、彭蒙、田骈同学”(《尹文子序》)。大概在齐宣王时,尹文与宋钘来到稷下学宫,居住下来,与田骈、彭蒙等稷下学者共同探讨学问。这一点在《尹文子》一书中,还可以找到内证。如《大道下》记述了宋钘与田骈、彭蒙讨论人治和法治的事情,而这件事为尹文耳闻目睹,当可靠无疑。《大道上》还引用了田骈、彭蒙关于确定名分的话,说明尹文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。《群书治要》卷三十七中有一条《尹文子》佚文,是这样

① 王恺鑫:《尹文子校正》,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,第40页。

② 唐钺:《尹文与〈尹文子〉》,罗根泽编《古史辨》第六册,第223页。

③ 以上所引均见金德建:《宋钘、尹文三论》,《四川师院学报》1981年第2期。

的：“田子曰：‘人皆自为，而不能为人。故君人者之使人，使其自为用，而不使为我用。’魏下先生曰：‘善哉，田子之言！’”孙诒让指出：“‘魏下先生’疑当作‘稷下先生’。此论田骈语，当尹文子自称。”^①厉时熙也说：“齐宣王时，田骈、尹文都曾在稷下学宫讲学。稷下先生可能是尹文的自称。”^②这些看法都是对的。既然尹文自称稷下先生，那他无疑是稷下学派中的人。其次，也不能只强调宋钘、尹文“下教”的一面，而忽视他们“上说”的一面。依尹文而论，他曾多次“上说”齐宣王、齐湣王。据《说苑·君道》记载，他曾以无为而治答齐宣王问。又据《意林》卷二、《艺文类聚》卷二十和《太平御览》卷四百二引述，他曾就“贤与不肖”的问题劝说齐宣王。《盐铁论·论儒篇》说：“齐宣王褒儒尊学，孟轲、淳于髡之徒，受上大夫之禄，不任职而论国事。”至于尹文是否“受上大夫之禄”，不得而知。但他在“论国事”这一点上，与“孟轲、淳于髡之徒”是没有什么不同的。《公孙龙子·迹府》、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·正名》、《孔丛子·公孙龙》都记载尹文与齐湣王论“士”，宣扬“见侮不辱”的论点。其中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·正名》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论皆若此，故国残身危，走而之谷，如卫。”对于这句话，学者的理解不同。有些学者将这句话译为：“湣王的议论都像这样，所以国家残破，自身危急，逃到谷邑，又到了卫国。”^③显而易见，这里把“论”者译成了“湣王”。但胡家聪认为，“论”是“指尹文之论”。他指出：“这里说的‘国残身危’，‘国残’指齐湣王末年（公元前284年）燕国将军乐毅率领燕、秦、赵、魏、韩五国之兵攻齐，大败齐军，占领齐都临淄，湣王出逃至莒，被楚将淖齿杀害；‘身危’指燕军进攻临淄，包括尹文在内的稷下先生们四散奔逃，尹文先至谷，后又到了卫国。经过这次大战乱，湣王之子襄王在莒五年，才回到已收复的临淄执政，而稷下之学大约也在这时恢复了。如《史记》所记：‘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。齐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为祭酒焉。’（《孟子荀卿列传》）尹文逃亡以后，这时是否回到稷下继续讲学呢？看来是大有可能的，因为其一，尹文比宋钘、田骈年纪轻，当能活到襄王之时。”^④我们觉得，《吕氏春秋》的那句话说得含含糊糊，难以断定是齐湣

① 孙诒让：《札逢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69页。

② 厉时熙：《尹文子简注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77年版，第50页。

③ 张双棣、张万彬、殷国光、陈涛：《吕氏春秋译注》，第542页。

④ 以上所引均见胡家聪：《〈尹文子〉与稷下黄老学派——兼论〈尹文子〉并非伪书》，《文史哲》1984年第2期。

王还是尹文,很可能二者兼而有之。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肯定,在齐襄王时,尹文不可能“回到稷下继续讲学”。因为尹文年长于荀子,如果尹文“回到稷下继续讲学”,那荀子就不会“最为老师”了。

第四个问题是尹文的师承关系。王启湘《尹文子校诠叙》指出:“宋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四引刘歆说,以为文居稷下,与宋钲、彭蒙、田骈等,同学于公孙龙。案龙为赵平原君客。赵公子胜,惠文王元年相赵,封平原君,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。上溯齐宣王元年,凡九十二年。歆谓文学于龙,误矣,似不如班固谓文先于龙为得其实也。或又据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,以为著书十四篇之公孙龙,即孔子弟子。刘歆谓文学于龙,盖指七十七人中之公孙龙而言,似亦不然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,公孙龙字子石,少孔子五十三岁。裴骃《史记集解》引郑玄说,以为楚人,为坚白异同之辩之公孙龙。则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以为赵人。唐当涂县丞殷敬顺《列子释文》,龙字子秉。《庄子·徐无鬼篇》,庄子谓惠子曰:‘儒、墨、杨、秉,四,与夫子为五。’夫子谓惠施,秉即龙也。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,即鲁哀公十六年,四月己丑卒,年七十三。龙少孔子五十三岁。孔子卒时,龙年二十。自孔子卒至齐宣王元年,凡百二十九年;至齐湣王末年,凡百八十七年;至赵孝成王十五年,平原君卒,凡二百二十年,龙已二百四十岁矣。然则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中之公孙龙,与《孟子荀卿列传》中之公孙龙,一字子石,一字子秉,一为楚人,一为赵人,其为两人明矣。故吾以为班固谓文先于龙为得其实,而以刘歆谓文学于龙为误也。”^①简而言之,在尹文前后有两个公孙龙,一为孔子弟子,一为平原君客,二人都不是尹文的老师。这个看法是不错的,但王启湘忽略了一个问题,即宋人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四所引刘歆之语是有脱误的。至于如何脱误,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考辨,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。《庄子·天下》在记述“宋钲、尹文”时说:“先生恐不得饱,弟子虽饥,不忘天下,日夜不休。”从行文的次序来看,宋钲在前,当为“先生”;尹文在后,当为弟子。这说明,尹文是师承宋钲的。但唐人杨倞注《荀子·正论》说:“宋子,盖尹文弟子。”不知何所据。唐钺指出:“杨氏以为宋钲是尹文的弟子,不过是‘想当然耳’。但宋钲确比尹文稍为后进。《荀子·正论篇》记荀况驳宋钲的话末了有‘二三子

^① 王启湘:《周秦名家三子校诠》,第20—21页。

之善于子宋子者，殆不若止之，恐将伤其体也。’是荀况倡说时，宋铎还在。荀况的年代大约是西纪前三一〇年至二三五年。^①据林春溥所考，宋铎遇孟轲时，孟轲正六十一岁，这大致可信。^②据《孟子》及《荀子》的记载，宋铎上及见孟轲，下及见荀况。假定宋铎遇孟轲的时候他约三十岁，那末，宋铎大约生于西纪前三四一年；他六十五岁，荀况三十四岁；荀况的《正论》大约发表于这个时候。又假定宋铎活七十五岁，那末，他大约死于西纪前二六七七年。假如这揣测没有大差，那末，宋铎大约比尹文少二十一岁。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说，‘宋铎是纪元前三六〇至二九〇年，尹文是纪元前三五〇至二七〇年’，^③是尹文反是宋铎的后辈，恐怕先后有点倒置。”^④我们觉得，这里似乎有两个漏洞：一个漏洞是唐钺认为，荀况的《正论》发表时，宋铎还在，他六十五岁，荀况三十四岁。若按梁启超考订的荀况生年（约公元前310年）推算，这一年当为公元前277年，即齐襄王七年。据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记载：“田骈之属皆已死，齐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。齐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为祭酒焉。”如果在齐襄王时，宋铎还在，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，而荀况只有三四十岁，那他怎么会“最为老师”呢？实际上，荀况发表《正论》时，宋铎早已不在人间。所谓“二三子之善于子宋子者，殆不若止之，恐将伤其体也”，乃是荀况写《正论》时的回忆之说。若以此来考订宋铎的生年，显然是有漏洞的。另一个漏洞是唐钺认为，宋铎遇孟轲时约三十岁，而孟轲六十一岁。这种看法是否切合实际？请看《孟子·告子下》的记载：

宋铎将之楚，孟子遇于石丘，曰：“先生将何之？”

曰：“吾闻秦、楚构兵，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。楚王不悦，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。二王我将有所遇焉。”

曰：“轲也请无问其详，愿闻其指。说之将何如？”

曰：“我将言其不利也。”

曰：“先生之志则大矣，先生之号则不可。先生以利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

① 梁启超：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，《清华周刊丛书》之一，第六七一七七页。

② 林春溥：《竹柏山房》十五种，嘉庆丙子竹柏山房版，内《孟子时事年表》第九页下及《孟子时事年表后说》第六一七页。

③ 胡适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第347页。

④ 唐钺：《尹文与〈尹文子〉》，罗根泽编《古史辨》第六册，第233—234页。

楚之王悦于利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终去仁义，怀利以相接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义说秦、楚之王，秦、楚之王悦于仁义，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，怀仁义以相接也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？”

上述记载中的“宋𦔻”即宋𦔻，因为“𦔻”、“𦔻”同音，故通用之。宋𦔻与孟子相遇时，孟子自称本名曰“轲”，而累称宋𦔻为“先生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焦循《孟子正义》解释说：“《礼记·曲礼》云‘从于先生’，注云：‘先生，老人教学者。’《国策·卫策》云‘乃见梧下先生’，注云：‘先生，长者有德者称。’《齐策》云‘孟尝君讌坐，谓三先生’，注云：‘先生，长老先己以生者也。’𦔻盖年长于孟子，故孟子以先生称之而自称名。”这个解释有理有据，可以相信。即或宋𦔻不年长于孟子，至少也必上下年纪，决不会相差三十余岁。很难设想，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会称三十岁的青年为“先生”。由此可见，唐钺之说漏洞甚大。既然如此，那他考订的宋𦔻生卒年代必有大差，说“宋𦔻大约比尹文少二十一岁”更不可信。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所说的宋𦔻、尹文生卒年代也不准确，但他并没有将二者的先后“倒置”。要说“倒置”，恐怕是唐钺自己倒置了。我们认为，宋𦔻起码与孟子同时，其主要经历当在齐威王、齐宣王时代，即公元前356—前301年。论年辈，宋𦔻长于尹文，大率是师弟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尹文是师承于宋𦔻的。

二、《尹文子》虽残而真

尹文师承宋𦔻，且观点也有相同之处，故《庄子·天下》将二人列为一派。《荀子·正论》说：“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，聚人徒，立师学，成文典。”（“典”字原作“曲”，依王念孙说校改）所谓“成文典”，是说著成文章。宋𦔻如此，尹文也不例外。据《世本》记载，尹文“著书五篇”。

但到汉代，《尹文子》一书则残缺不全，已佚四篇，只剩一篇。这种说法既

非猜测,又非妄断,而是有凭有据的。其确凿证据有两条:一条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名家著录“《尹文子》一篇”。众所周知,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依傍刘歆《七略》作成;而刘歆《七略》所因者,乃刘向《别录》。《文心雕龙·诸子篇》黄叔琳注引刘向《别录》说:“尹文子学本庄、老,其书自道以至名,自名以至法;以名为根,以法为柄;凡二卷,仅五千言。”《周氏涉笔》也说:“刘向谓其学本庄、老,其书先自道以至名,自名以至法;以名为根,以法为柄。”(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一二《经籍考》子类名家《尹文子》下引)两说相合,可靠无疑。但有人却不以为然,如唐钺在《尹文和尹文子》一文中指出:“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十》,杂家类《尹文子提要》内说《周氏涉笔》谓其‘自道以至名,自名以至法’,是把周氏说是刘向的话当做周氏自己的话,似乎已经不信刘向有这话。《文心雕龙》黄注本来有许多靠不住,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内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、《尹文子》下也没有引‘刘向’这个话。所以这些唐以后书所称刘氏父子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靠不住的。”^①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。首先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把周氏说是刘向的话当做周氏自己的话,乃是一个疏漏,并非“不信有这话”。其次,不能以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内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、《尹文子》下没有引刘向这个话,而否定《文心雕龙》黄注的可靠性。因为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并不完备,特别是史、子两编数量少又多所遗漏。所以,不能以此来否定《文心雕龙》黄注的可靠性。另一条证据是高诱注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·正名》说:尹文“作《名书》一篇”。这个说法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一致,自然也是可靠的。从刘向《别录》、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和《吕氏春秋》高注可以看出,汉代流行的《尹文子》只有一篇,篇名曰《名书》;“凡二卷,仅五千言”;“其书自道以至名,自名以至法;以名为根,以法为柄”。

若将汉代流行的《尹文子》与今本《尹文子》加以比较,我们就会发现二者的卷数、字数和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,只是篇名、篇数有所不同而已。汉代流行的《尹文子》是一篇,篇名曰《名书》;而今本《尹文子》的篇名为《大道》,分上下两篇。有人以此为借口,企图否定今本《尹文子》的真实性。如罗根泽在《尹文子探源》一文中指出:“篇数既异,篇名亦殊,其非旧制,有何疑义。”^②他所谓

① 唐钺:《尹文与〈尹文子〉》,罗根泽编《古史辨》第六册,第232页。

② 罗根泽:《〈尹文子〉探源》,罗根泽编《古史辨》第六册,第246页。

的“其非旧制”，是说今本《尹文子》并非汉代流行的《尹文子》。这种说法的失误在于，无视今本《尹文子》与汉代流行的《尹文子》在卷数、字数和基本内容上的一致性。今本《尹文子》分上下两卷，约五千余字，与刘向《别录》所谓“凡二卷，仅五千言”是相合的。刘向《别录》所谓“其书自道以至名，自名以至法；以名为根，以法为柄”，也与今本《尹文子》的内容相合，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“盖得其真”。对于这一点，唐钺也是无法否认的。他说：“如刘向真有此话，那末，刘歆、班固所见的《尹文子》的内容，与现行本多少相同。”^①实际上不是“多少相同”，而是基本一致。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会出现“篇数既异，篇名亦殊”的问题呢？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。今本《尹文子》前有“山阳仲长氏撰定”的《尹文子序》一篇，原文如下：

尹文子者，盖出于周之尹氏。齐宣王时居稷下，与宋钲、彭蒙、田骈同学于公孙龙，公孙龙称之。著书一篇，多所弥纶。《庄子》曰：“不累于物，不苟于人，不忤于众，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，人我之养毕足而止，以此白心”；“见侮不辱”。此其道也。而刘向亦以其学本于黄老，大较刑名家也。近为诬矣。余黄初末始到京师，繆熙伯以此书见示。意甚玩之，而多脱误，聊试条次，撰定为上、下篇，亦未能究其详也。

此序原文虽有错讹衍脱，但仍可说明问题。所谓“著书一篇”，是指《汉书·艺文志》名家著录的“《尹文子》一篇”和高诱注说的“著《名书》一篇”。也就是说，汉代流行的《尹文子》原本一篇。仲长氏从繆熙伯得到此书后，因其“多脱误，聊定条次，撰定为上、下篇”。从此以后，汉代流行的《尹文子》就由一篇被分作上、下两篇了。两篇之名，就是今本的《大道上》和《大道下》。这一点，虽然仲长氏并未明言，但从其撰定的《尹文子序》中可以看出。他认为《庄子》对尹文之“道”的概括和“刘向亦以其学本于黄老”的做法都是对的，但不同意刘向把尹文之学的大旨归于“刑名家”，故曰“近为诬也”。这表明处在魏晋玄学盛行时代的仲长氏是倾向于道家的，因而把篇名改为《大道》了。

① 唐钺：《尹文与〈尹文子〉》，罗根泽编《古史辨》第六册，第220页。

对于仲长氏的这种做法,学界颇有异议。胡家聪在《〈尹文子〉并非伪书》一文中指出:“那位好事的仲长氏,写了序言,把本为一篇的《尹文子》分为《大道》上下两篇。如今我们认真研读全书,分作两篇甚为牵强。”^①这个说法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晋人崔譔就认为,尹文“著书一篇”。显而易见,他是不同意仲长氏把《尹文子》分为上、下两篇之做法的。南北朝时期,梁人刘勰曾经指出:“尹文课名实之符。”(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)言下之意,《尹文子》是《名书》,将篇名改为《大道》是不妥的。唐初魏徵《群书治要》引《尹文子》,上篇虽名为《大道》,但下篇却改名为《圣人》。谭戒甫对此有个解释,他说:“《群书治要》录其篇名曰《大道》,曰《圣人》。因上篇首有‘大道无形’句,下篇首有‘圣人错而不言’句,故以名篇。”^②后来,《尹文子》收入《道藏》时,其篇名又改为《大道上》、《大道下》。钱大昭指出:“今《道藏本》上下二篇(《大道篇》上下),盖本魏黄初末山阳仲长氏詮次之旧。”^③

仲长氏擅改《尹文子》的篇名和篇数固然不妥,但他在《尹文子序》中确实讲明了今本《尹文子》的来历。如说:“余黄初末始到京师,繆熙伯以此书见示。意甚玩之,而多脱误,聊试条次,撰定为上、下篇,亦未能究其详也。”也就是说,仲长氏所编次的《尹文子》是繆熙伯“见示”的。这里有两个问题:繆熙伯何许人也?仲长氏又何许人也?宋人晁公武指出:“李献臣云:‘仲长氏,统也;熙伯,繆袭字也。’传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年,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师,岂史之误乎?”(《郡斋读书志》)所谓“传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年”,即指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所言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劭传》注引繆袭撰仲长统《昌言》表,言仲长统卒于延康元年。汉献帝逊位之年乃延康元年(公元220年)，“黄初”乃魏文帝年号(公元220—226年)。仲长统已卒于延康元年，怎能于“黄初末始到京师”？由此可知，撰序之“山阳仲长氏”未必是仲长统。所以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指出：“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误，未免附会矣。”唐钺进一步考证说：“按《魏志》卷二十一《刘劭传》云‘繆袭亦有才学，多所述叙。……（注引《文章志》曰：‘袭字熙伯。’）袭友人山阳仲长统，汉末为尚书郎……’这样看来，撰序的人是故作狡狴，影射仲长统。惟未曾细考仲长氏

① 见陈鼓应主编：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二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354页。

② 谭戒甫：《公孙龙子形名发微》，第112页。

③ 转引自范文澜：《文心雕龙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，第312页。